

# 序

1842

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成立於 1995 年，首要的目標是收集和保存與香港醫學發展有關、具有歷史意義的物品，並在香港醫學博物館展出。第二個目標是促進香港醫學發展史的研究，以及提高公眾對醫學史的興趣。為此，香港醫學博物館組織了文物徑導賞團，並出版有關本地醫學歷史的文章、小冊子和書籍。此外，學會還定期舉辦醫學史及其他醫學專題的講座，以喚起市民對醫學史的興趣，提醒他們注意健康和預防疾病的重要性。

1941

本書的兩位作者經常為香港醫學博物館撰稿，刊登於《香港醫學雜誌》的專欄——「懷舊：香港醫學博物館的文物」。黃大偉醫生曾編輯有關本地醫學史的書籍，包括香港醫學博物館 20 週年紀念刊物——《杏林鴻爪：香港醫學博物館藏品選》。陳慕華教授出版了三本精心研究的香港醫學史專著，涵蓋 1842 至 2015 年的醫學發展。得知兩位計劃撰寫有關歷代名醫的新書，深慶得人，亦熱切期待其研究結果。

1945

本書可能是第一本講述塑造香港醫學發展的醫生，他們的生平和時代。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先賢如何將一個只有簡陋醫療設施的地方變成了今天的樣子——一個與任何西方主要城市一樣擁有先進醫療服務的都會。作為病理科醫生，我自然會被亨特醫生、王寵益教授、侯寶璋教授和紀本生教授等前輩的故事所吸引；他

2015

2

們為香港的現代病理學奠定堅實的基礎，特別是亨特，他負責監督建造細菌學檢驗所，也就是今天的香港醫學博物館。除了故事有趣外，閱讀這些傑出醫生一個半世紀多以來所成就的功業，讀者將會更了解本地醫學的發展，包括：公共衛生、公共醫療服務、醫學教育和私人執業等領域。本書還為研究相關領域的人，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來源。

香港醫學博物館一直使用不同的文物，來喚起公眾對醫學歷史的興趣。通過歷代名醫的生平來講述醫學史，也是吸引大眾的一個很好的方式。本書原以英文寫成，中文版由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出版，以饗廣大讀者。這本新書是本地醫學史學術著作的又一力作，我們誠意推薦。

麥衛炳醫生

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主席

序

3

# 目錄

序 麥衛炳醫生	P2-3
前言	P8-9
縮寫	P10-13
緒論	P14-19

1842

## 第一部分：二次世界大戰前（1842 - 1941）

第一章 醫務傳教士：把西醫傳入香港 維魏林 · 合信	P22-28
第二章 殖民地醫官和政府醫官：建立香港的醫療、衛生和健康服務 艾爾斯 · 艾堅信 · 克拉克 · 亨特 · 衛寧敦	P29-65
第三章 弘揚西醫的醫生：創辦雅麗氏紀念醫院及香港西醫書院 何啟 · 白文信 · 康德黎 · 佐敦 · 譚臣 · 何高俊	P66-109
第四章 早期醫學教育工作者：為香港大學醫學院奠下基礎 狄比 · 安爾 · 王寵益 · 安達臣 · 托定咸	P110-139
第五章 熱心公益的私人執業醫生：改善醫療和教育 李樹芬 · 胡惠德 · 蔣法賢	P140-161
第六章 女醫生先驅：改變香港女性醫學的範式 西比 · 何綺華 · 賴寶川	P162-183

1941

1941

## 第二部分：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1 - 1945）

.....

1945

第七章 戰時英雄：在困境中做出艱難的選擇 司徒永覺 · 賴廉士 · 王國棟	P186-205
---	----------

# 目錄

1842

1945

## 第三部分：二次世界大戰後（1945 - 2015）

第八章 P208-229

政府公共衛生專家：促進醫療保健系統現代化

楊國璋 · 蔡永業 · 李紹鴻

第九章 P230-252

政府專家：發展新的醫學分支

何鴻超 · 葉寶明 · 聶守德

第十章 P253-293

戰後大學教育工作者：培養醫生和培訓專家

侯寶璋 · 紀本生 · 麥花臣 · 達安輝 · 侯信 · 王源美

第十一章 P294-320

私人執業醫生：參與政治以改善醫療和康復服務

李仲賢 · 羅理基 · 方心讓

第十二章 P321-334

首兩位女教授：開創新天地的女醫生

秦惠珍 · 田綺玲

第十三章 P335-361

最後的醫務傳教士：以行動傳播福音

巴治安 · 區貴雅 · 紀寶儀

結語 P362-364

附錄：香港醫療衛生機構及主要官員稱謂 P365

參考文獻 P366-381

鳴謝 P382-383

1941

1945

2015

2015

# 前言

1842

西醫在香港發展超過 150 年才達到今天的高度，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陳慕華教授著有三本香港醫學史著作，包括：《香港醫學史：1842-1941》、《香港醫學史：1942-2015》和《香港醫學史：門診服務的發展與貢獻》，涵蓋 1842 至 2015 年期間，描述在當時社會、政治和經濟形勢背景下，香港醫學界發生的重大事件。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出版的《瘟疫、SARS 與香港醫學的故事》也採用類似的方法，通過不同的主題來探討香港的醫學史，其中包括傳染病和結核病的控制，以及醫院和醫學教育發展的章節。

歷史事件通常由多種力量，如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在特定時間和範圍內發生驅動作用。然而，我們認為人的因素在塑造歷史事件方面同樣重要。本書以不同的角度，講述香港環境衛生和醫療保健事業的發展史——以傑出人物為着眼點，為香港這段非凡的醫學史增添層次和色彩。這些人物應包括醫生、護士、專職醫療人員，以及不應僅被視為被動接受治療的病人。鑑於本書篇幅所限，我們只能聚焦於已去世的醫生，記述他們如何開創和籌劃香港的醫療衛生服務，令它發展壯大。

1941

雖然這些醫生來自不同的背景，生活在不同的時代，從事不同的醫學專科，但他們在幾個方面卻驚人地相似：對服務社區的奉獻精神，為實現目標而不懈努力；在逆境中的堅持，讓他們在香港醫學史上留名。這些人物跨越 150 多年，包括：政府醫療衛生部門的醫生，他們設定基本架構，制定衛生政策，倡導新措施，推動醫療衛生系統向前發展；醫學教育工作者，培訓醫務人才，通過研究，創造新的醫學知識；執業醫生，不僅提供醫療服務，還獻身於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本書中每位醫生的故事都是以他 / 她所處的時代，在面對複雜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背景下講述的。我們還選取了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為數不多的女醫生先驅，描述她們如何爭取進入醫學院和一生

1945

2015

8

的成就。

本書面向醫學生、執業醫生、其他專職醫療人員，以及普通讀者。我們希望這些醫學先驅的故事，能夠引起醫學界讀者對本地醫學史的興趣，並向這些先賢學習。我們也希望初次涉足醫學史的普通讀者能發現它的魅力。這些傑出醫生，從無到有，建立起香港的醫療服務，讓我們擁有先進的醫療基礎架構，足以媲美世界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香港人的預期壽命領先世界，可作為前人辛勞的見證。<sup>1</sup> 我們希望在此緬懷和讚頌他們鼓舞人心的一生，並感謝他們的無私奉獻。

香港公共醫療衛生部門在不同時期會被冠以不同的名稱，例如醫務署、醫務衛生署等。我們根據相關期間的稱呼而使用當時的名稱（見附錄）。此外，眾所周知，醫學界因其眾多的專業頭銜而令人困惑，尤其是在使用縮寫形式時。這些頭銜及其縮寫的列表，可以在本書前部的縮寫部分找到。最後，本書採用了許多第一手與第二手資料，這些資料的來源，可以在書後的參考文獻找到。

黃大偉 陳慕華

2023 年 9 月

1 CUHK eNews. January 2021. *Why Hong Kong has the Longest Life Expectancy in the World*. [https://www.oal.cuhk.edu.hk/cuhkenews\\_202101\\_life\\_expectancy/](https://www.oal.cuhk.edu.hk/cuhkenews_202101_life_expectancy/);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society/article/3181505/hongkongers-are-living-longer>

## 緒論

1842

鴉片戰爭後，香港於 1842 年被割讓給英國。對外國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不健康的地方。不少駐軍患上可能是瘧疾引起的「香港熱」，可以執勤的士兵寥寥無幾。1850 年左右，殖民地醫官在租來的房子開辦了國家醫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以便集中一個地方照顧所有病人。政府對這個新城市的衛生狀況關注不足，香港衛生差劣的惡名因而遠播。1894 年，可怕的鼠疫終於降臨這座城市，造成數千人死亡。這場駭人聽聞的疫症敲響了警鐘，當局不得不對公共衛生基礎設施進行全面改革。從此，醫療衛生服務逐漸改善。今天，香港市民都很長壽，人均壽命居世界前列，醫療衛生服務水平與發達國家相近。

本書分為三個時期——二次世界大戰前（第一至六章）、戰爭期間（第七章）和戰後（第八至十三章）。人物按不同的身份類別劃分：醫務傳教士、政府醫療衛生機構的醫生、醫學教育工作者、私人醫生和女醫生。

第一章描述香港割讓給英國後不久，醫務傳教士將西醫引入香港。兩名醫務傳教士，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的維魏林（William Lockhart）和合信（Benjamin Hobson），分別於 1842 年和 1843 年抵達香港。維魏林在灣仔摩理臣山興建了傳道會醫院，而合信則在維魏林離港後繼續經營該醫院。由於缺乏資金，醫院於 1850 年代初期關閉。30 年後，醫務傳教士重返香港，為華人創辦了雅麗氏紀念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HKCM），在傳播西醫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他們的努力下，西醫逐漸為香港華人所接受。

香港醫療衛生發展的基石在於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建立，政府首先任命一名殖民地醫官，負責為公務員、警察和囚犯提供醫療保健服務。那時候，殖民地醫官既是臨床醫生又是行政人員，正如第二章有關艾爾斯（Philip Burnard Chenery Ayres）醫生的描述那樣。

他為改善香港的衛生狀況，長期努力不懈，但政府直到 1894 年的瘟疫肆虐之後，才意識到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並着手改善。艾爾斯的繼任者是艾堅信（John Mitford Atkinson），他的新頭銜是首席民事醫務官（Principal Civil Medical Officer），而克拉克醫生（Francis Clark）則是首任衛生醫官，他們肩負改革香港醫療和衛生服務的艱鉅任務。1902 年，第一位政府細菌學家亨特（William Hunter）的任命，以及細菌學檢驗所的成立都是鼠疫後為了抗擊鼠疫和其他傳染病的新措施。在 1930 年代，當衛寧敦（Arthur Wellington）成為醫務衛生總監時，他重組了政府醫療服務的架構。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香港政府的醫療衛生服務在這些勤懇、敬業的醫生和行政人員的努力下，得到較為完善的發展。

第三章講述了三組人，在 1887 年通過建立雅麗氏紀念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HKCM），共同致力於培育年輕華人西醫，以便在當地普及和傳播西醫。首先，LMS 的傳教士捐贈土地，用於建造雅麗氏紀念醫院。LMS 還任命醫務傳教士譚臣（J. C. Thomson）為醫院的院長。第二，捐資興建醫院以紀念其夫人的何啟醫生，以及負責籌集醫院運營資金的其他華人精英。第三，香港的私人執業醫生，為醫院的病人義務診治，並為西醫書院的學生授課，其中包括當時社會上頗有名望的白文信（Patrick Manson）、康德黎（James Cantlie）和佐敦（Gregory Jordan）。HKCM 培養了 60 名畢業生，但他們的執照不被英國醫務委員會認可，不能在香港行醫。最終他們成為政府僱員為香港服務；其中一位，本章提到的何高俊醫生，是街坊醫生的楷模，他在華人公立醫局（Chinese Public Dispensary, CPD）工作，為灣仔居民服務多年。

HKCM 併入香港大學（HKU）成為其醫學院，迎來了另一批來自英國的醫學教育工作者。第四章，介紹港大不同時期的全職教授，包括：狄比（Kenelm Digby）（解剖學、外科）、安爾（H.G.

1941

1945

2015

14

1842

Earle) (生理學)、王寵益 (病理學)、安達臣 (John Anderson) (內科) 和托定咸 (Richard Tottenham) (婦產科)。他們為新醫學院奠定基礎。與西醫書院的畢業生不同，港大醫學院的畢業生得到英國醫務委員會的認可，可以在香港執業。

20 世紀之前，歐籍醫生是私營醫療的主力，主要服務洋人。1920 年代後，西醫書院和港大的畢業生才成為私營醫療的重要力量；有兩個重要事件顯示本地華人醫生的影響力增加：第一，香港中華醫學會成立；第二，華人醫生開辦第一家私立醫院——香江養和園；養和園後改建為養和醫院，至今仍然營運。二戰前的醫學畢業生中，有三位熱心公益的私人醫生，除了醫療服務外，還為教育和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是第五章中描述的李樹芬醫生、胡惠德醫生和蔣法賢醫生。

1941

第六章介紹的女醫生，在本地醫學界出現較晚。西比醫生 (Alice Hickling, 婚前姓 Sibree) 是香港第一位女醫生；她於 1904 年從英國抵港，在雅麗氏產科紀念醫院工作，期間引入了西方的接生方法。她亦是香港母嬰保健服務的先驅。1921 年賴寶川入讀香港大學，成為首位醫科女學生。何綺華於次年春天入學，於 1927 年畢業，她是第一位醫科女畢業生。這三位女醫生都專攻婦產科，對女醫生來說，這是一個為社會認可的領域。

1945

日軍於 1941 年 12 月侵港，港府向日軍投降後，醫療體系崩潰。所有歐籍醫生，包括許多政府醫生和大學醫科教授都被關押在平民或戰俘拘留營中，許多本地醫生逃往中國大後方。第七章所記述的三位傑出歐籍醫生，在此困難時期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為香港服務。戰前的醫務總監司徒永覺 (Percy Selwyn-Clarke) 醫生，儘管面對被指控通敵的風險，還是選擇留任，以維持基本的公共衛生服務。香港大學生理學教授賴廉士 (Lindsay Ride) 從戰俘營逃到中國，在那裏成立英軍服務團 (British Army Aid

2015

16

Group, BAAG)。王國棟 (Gordon King) 教授在被送進拘留營前，秘密離開港大臨時醫院，逃到中國後方，在內地幫助港大學生繼續學業。

戰後，診斷技術快速發展，新藥也大增。抗生素的出現徹底改變了傳染病的治療，包括肺結核。能有效治療精神病的藥物面世，讓精神病的治理發生了重大的範式轉變。與此同時，香港在許多方面都經歷了轉變，包括：人口、人口結構、經濟狀況、生活方式和疾病模式。戰後不久，人口暴漲，令香港所有的社會服務不堪重負。隨着香港從轉口港轉變為製造中心，經濟在 50 年代後期有所改善，並在 60 年代後期真正騰飛。社會日益富裕，提升了生活水平，也帶來更好的食物。這反過來改變了疾病模式，非傳染性疾病在 20 世紀 70 年代初，取代傳染病成為對健康的主要威脅。二戰後，對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醫生們也按戰前的同一類別劃分，在餘下的章節分別介紹。

第八章介紹的醫生都是政府醫療衛生部門的首長，包括：楊國璋 (1952 - 57 年)、蔡永業 (1970 - 76 年) 和李紹鴻 (1989 - 94 年)。楊國璋是首位華人醫務衛生署署長，在他的領導下，克服了許多流行傳染病。蔡永業在 1970 年上任後，面對快速發展的香港，重組了醫院服務，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在醫務衛生署重組為醫院事務署和衛生署兩個部門後，李紹鴻成為首任衛生署署長，他提倡基層醫療保健。

政府也在戰後發展公立醫院的專科服務。除了傳統的醫學分支，如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和骨科，隨着醫學知識的進步和技術的創新，新的專科也應運而生。第九章講述了這些先驅的精彩故事，包括：放射診斷和放射治療 (何鴻超醫生)、精神健康 (葉寶明醫生) 和麻醉學 (聶守德醫生)。他們從無到有，發展各自的專科，讓香港的水平能與發達國家看齊。

1842

在第十章，我們總結了戰後大學的成就，教授們如何重建師資隊伍和開拓新專業領域。他們包括：病理學的侯寶璋教授（1947 - 60年）和紀本生教授（James Gibson, 1963 - 83年）；內科的麥花臣教授（A. J. S. McFadzean, 1949 - 74年）和達安輝教授（1975 - 94年）；骨科的侯信教授（Arthur Hodgson, 1961 - 75年）和外科的王源美教授（1964 - 82年）。他們擴大了學系，增加了新的亞專科，為患者引進最新的臨床服務，並為研究生提供培訓機會。在他們各自的研究領域，每個人都把香港推上了世界醫學的舞台上。

戰後，兩間大學的醫學院，培養出越來越多的畢業生，私人執業醫生的數量也有所增加。第十一章介紹的三位傑出私家醫生，包括：李仲賢、羅理基（Alberto Rodrigues）和方心讓都為醫療服務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李仲賢創立了全科醫學學院（後更名為家庭醫學學院），以提高全科醫生的水平。羅理基和方心讓是專科醫生，他們都曾是立法局和行政局的議員，在戰後的頭30年就醫療服務的發展向政府出謀獻策。

今天，香港兩所大學的醫學院，錄取的女生比男生可能會略多一些（2020年的男女比例為1.18:1），女醫生在骨科和心臟外科等傳統上以男性為主的專科，也有一定的代表。直到二戰後，女醫生才有機會晉升到更高的學術或專業職位。第十二章的兩位女主角是田綺玲教授（Elaine Field）和秦惠珍教授。田綺玲教授創立了港大兒科學系。土生土長的秦惠珍教授接替王國棟教授，成為港大首位婦產科女教授。秦惠珍提高了贊育醫院和香港的產科服務水平。

雖然傳教士醫生將西醫引入香港，但他們的作用逐漸減弱（見第十三章）。巴治安（Edward Paterson）醫生在戰後加入那打素醫院時，是LMS 100多年來華醫務傳教士中的最後一位。他建造了夢想中的醫院，一間「沒有圍牆的醫院」——香港基督教聯合醫院。聖高隆龐修女1949年應邀到香港，管理律敦治療養院，她們領導

香港抗擊結核病的工作。巴治安和聖高隆龐修女分別於1989年和2015年離開香港，結束了香港醫務傳教士的重要一章，也是本書的終章。他們150多年來無私奉獻，為香港市民辛勤工作，將載入我們的醫學史冊，讓人們永遠銘記。

這本關於歷代名醫的書，關注的是人的因素，這是除了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之外，推動醫療衛生服務發展最重要的力量。除了醫療服務外，這群傑出的醫生在醫學教育、研究和制定醫療保健政策方面，也扮演一定的專業角色，對推動香港醫療事業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1941

1945

2015

18

1842

第一  
部分

*William Lockhart Benjamin Hobson*

*Philip Burnard Chenery Ayres John Mitford Atkinson*

*Francis Clark William Hunter*

*Arthur Robartes Wellington John Christopher Thomson*

*Patrick Manson Gregory Paul Jordan*

*Ho Ko Tsun Ho Kai*

**【二次世界大戰前】**

1842 to 1941

*Li Shu Fan James Cantlie*

*Kenelm Hutchinson Digby Wang Chung Yik*

*John Anderson Richard Edward Tottenham*

*Herbert Gastineau Earle Woo Wai Tak Arthur*

*Tseung Fat Im Alice Hickling*

*Eva Ho Tung Lai Po Chuen Pauline*

1941

1945

2015





1842

## 第一章

## 醫務傳教士：把西醫傳入香港

1941

西醫傳入中國是一個集合了信仰、慈善和奉獻的故事。這些傳教士，尤其是來自歐洲和北美的醫務傳教士，試圖透過醫療服務將基督教引入中國。儘管基督教早在公元 635 年就傳入中國，此後斷斷續續，但從未真正紮根，直到 19 世紀，由於西方世界三種因素的結合——大學教育、基督徒的個人覺醒以及宣教服務的召喚，大量傳教士抵達中國。<sup>1</sup> 在英國本土，福音派的復興，恰逢大英帝國的帝國主義擴張，導致海外傳教活動大增。

19 世紀初，幾位醫務傳教士來到中國。其中，來自美國的傑出醫生伯駕（Peter Parker），於 1835 年在廣州開設了一家主要施行眼科手術的醫院。醫務傳教士的目的，是通過治癒病人，同時培養互信和友誼，將基督的福音介紹到中國。香港在 1842 年成為殖民地後，通常的角色只是進入中國的門戶，而不是一個傳教點。本章專門介紹，兩位最先來到香港的醫務傳教士的工作。1842 年，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的維魏林（William Lockhart）抵達香港，並建造了醫務傳道會醫院（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Hospital）。他的繼任人合信（Benjamin Hobson），幾年後也離開香港去了中國。醫院維持的時間不長，1853 年因資金困難關閉。

<sup>1</sup> Robin Boyd, *The Witness of the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London: Society of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2007), 1.



1811-1896

## 維魏林

**William Lockhart**

MD, MRCS

圖片來源：  
Wellcome Collection.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維魏林是第一個踏足香港的醫務傳教士。他出生在利物浦（Liverpool），曾在倫敦（London）的蓋伊（Guy's）醫院和都柏林（Dublin）的希思（Heath）醫院受訓。在成為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的院員（MRCS）後，他加入了LMS，並於1839年抵達澳門。在澳門，維魏林重開因伯駕回廣州而關閉了的醫院。不久，英國因準備第一次鴉片戰爭而撤僑，維魏林也不得不離開澳門。接下來的兩年，維魏林在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Jakarta）、廣州和舟山學習中文。1841年他從舟山撤離，返回澳門。1842年，他奉命經香港返回舟山。此時，香港因第一次鴉片戰爭而被割讓給英國。他被留在香港，負責監督LMS計劃興建的新醫院——醫務傳道會醫院。雖然維魏林是第一個抵達香港的醫務傳教士，但他並沒有在當地行醫，因為在醫院建成後，LMS指示他繼續前往中國執行更重要的任務。維魏林隨後在中國各地，包括上海和北京，建立了多家醫院。

從事醫務傳道工作20年後，他寫了一本書，<sup>2</sup>《醫務傳教士在中國：二十年經歷的記敘》。<sup>3</sup>他得出的結論是，醫療和傳教工作不應該由同一人執行，因為醫生很難找到時間來「拯救靈魂」。

2 G. H. Choa, "Heal the Sick" was their Motto. *The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4-25.  
3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61).



1816-1873

## 合信

**Benjamin Hobson**

MB, MRCS

圖片來源：  
Wellcome Collection.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下一位來到香港的醫務傳教士是合信，他是倫敦大學的傑出畢業生，獲頒醫學士學位，並且是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的院員（MRCS）。他於1839年12月抵達澳門，以LMS醫務傳教士的身份，主理那裏的一家傳教醫院。<sup>4</sup>1843年維魏林離開香港時，合信奉命關閉澳門的醫院，並將設施搬至香港新落成的醫務傳道會醫院。這家擁有42張病床的醫院，位於灣仔摩利臣山（Morrison Hill），馬禮遜教育協會在此也建立了一所學校。三年後，合信因妻子患上間歇性發熱而回到英國休假。在回英的船上，她不幸去世。1847年回港前，他娶了馬禮遜的女兒，馬是第一位到澳門的新教傳教士。然而，回港後不久，合信被調往廣州，就此告別了醫務傳道會醫院。在廣州，他在沒有外國人進駐的金利埠開了一家醫院。1854至1855年間，廣州因清兵與太平天國叛軍交戰而被圍困。合信被迫離開，前往上海。他離開得正好，因為金利埠的醫院在1856年也被大火燒毀。在上海，合信從即將休假的維魏林手中，接管了一家醫院。合信沒有留在上海太久。他1859年離開中國，留在英國直到1893年去世。<sup>5</sup>

4 "Obituary, Benjamin Hobson, MB, MRCP," *Brit Med J*, (29 March 1873): 355.  
5 Choa, "Heal the Sick" was their Motto, 26.

合信在香港和中國居留的時間雖短暫，且當時政治環境非常不穩定，他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臨床醫生，治療了各種在香港極為普遍的眼部疾病。他描述了諸如跗眼炎、慢性眼炎、倒睫（睫毛內翻）、眼瞼內翻、角膜混濁和血管增生等眼部疾病。這些病況可能是沙眼（Trachoma）的不同表現。沙眼現在已知是由衣原體（Chlamydia）感染引起，是一種高度傳染性的疾病。合信正確地指出，感染源於中國剃頭匠在日常「洗眼」過程中，將下眼瞼外翻，並用象牙或竹製器具刮擦，因而經由一個人傳染給另一個人。<sup>6</sup> 合信用「銀硝酸鹽蒸餾水溶液、次醋酸鉛及銅和鋅的硫酸鹽的強溶液」治療衣原體感染。在抗生素出現之前，含有 1% 硝酸銀和 1/4% 硫酸銅溶液的藥物，是治療沙眼感染的標準方法。合信為白內障患者施手術，25 例中 11 例完全成功，12 例部分成功，2 例失敗。和其他醫務傳教士如伯駕一樣，合信也為疝氣、大蒂腫瘤，甚至乳癌患者進行手術，在部分患者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合信在給 LMS 的第二份報告中，詳細描述了痲瘋病，乃至患者的明顯毀容，以及當時缺乏有效的治療。<sup>7</sup> 他也為香港的兒童接種牛痘，用的是從英國帶來的疫苗，且甚少引起嚴重反應。<sup>8</sup> 中國很早就有種痘，但用的是活性天花病灶的材料，有時接種後會導致致命的天花感染。

合信更重要的貢獻是在醫學教育，主要在出版他用中文寫成的醫學書籍，而不在教導醫學生。受過科學訓練的合信，認為中醫沒有科學依據，他希望帶給香港和中國一個合理的醫學體系。他教

授年輕助手陳阿斌（Chan Apun）物理、化學、生理學，以及各種疾病的治療和眼科手術。1845 年 5 月 13 日，中華內外科醫學會（China Medico-Chirurgical Society）在香港召開的第一次會議，合信為首任秘書，與會同仁普遍支持培訓當地中醫學習西方醫學。有會員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在香港設立一所正規的醫學院。<sup>9</sup> 陳阿斌通過當地一群醫生的考試後，<sup>10</sup> 合信向醫務傳道會委員會請求，准許招收男生參加醫學預科課程，以便他們能在醫院見習。<sup>11</sup> 1846 年，合信回英休假時，他為籌辦醫學院募集了大約 300 英鎊。回港後他的希望落空了，因為支持該項目的當地醫生不是離去，就是去世，而馬禮遜教育協會學校的校長，亦已將所有聰明的學生帶到美國繼續學業。<sup>12</sup> 未能實現在香港開辦醫學院的夢想，合信用籌集到的資金在廣州金利埠開辦了一家醫院，並繼續栽培陳阿斌。

儘管在香港受到挫折，他還是寫了六本中文醫學書籍，幫助推動了中國的西方醫學教育。這些書籍，再經中國文士用優雅的中文潤飾，讀起來輕鬆有趣。其中，管茂材最為有名，他本人亦對西醫很感興趣。<sup>13</sup> 六本醫書分別是：1. 《全體新知》（*Outline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 1851）；2. 《博物新編》（*Natural Philosophy and Natural History*, 1851）；3. 《內科新說》（*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1858）；4. 《西醫略論》（*First Lines of Practice of*

9 Choa, "Heal the Sick" was their Motto, 67–68.

10 Hobson, Benjamin.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Hongkong," Chinese Repository 14 (1844):380–381.

11 醫務傳道會於 1838 年在廣州成立，以支持伯駕醫生和眼科醫院。1845 年，醫務傳道會部分成員赴港，並在香港設立分會。

12 C. T. Smith,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5), 299–302.

13 Chuang-Ye Hong, Fu-Mei Wang.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Textbooks on Internal Medicine from the 1850s to the 1940s. ScienceDirect,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77 (2014): 277–282.

6 Ibid., 38–39.

7 Ibid., 50.

8 Marilyn Laura Bowman, *James Legge an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Brilliant Scot in the Turmoil of Colonial Hong Kong* (Vancouver: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15), 280.

## 殖民地醫官和政府醫官： 建立香港的醫療、 衛生和健康服務

*Surgery in the West*,1857)；5.《婦嬰新說》(*Treatise on Midwifery and Diseases of Children*,1858)及 6.《中英文醫學詞彙》(*The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1858)。前兩本書在廣州出版，合信於 1855 年左右遷往上海，餘下書籍在上海出版。合信的著作，以其精美的插圖和詳細的解剖圖，得到廣泛流傳，最終傳到日本更為人知。<sup>14</sup>

儘管華人不信任外國人和他們的醫藥，但合信卻贏得當地人的信任。醫務傳道會醫院雖然只有 42 張病床，但有時住院病人多達 85 人。它向中國人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同時宣講福音。1848 年，醫務傳道會醫院由何斯伯醫生 (Dr. Henri Hirschberg) 繼任，醫院在他的管理下一度蓬勃發展。<sup>15</sup> 醫院因免費治療導致財困，加上未能找到合適的人選來代替求去的何斯伯，因而大約在 1853 年關閉。何斯伯在醫院管理上與 LMS 有分歧，加上一些個人問題因而離職。<sup>16</sup>

近 30 年後，在來自加拿大的楊威廉醫生的推動下，LMS 再次嘗試在香港提供醫療服務。



合信《全體新知》

14 S. M. Hillier and J. A. Jewell, *Health Ca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3) 11.

15 T. M. K. Wong, "Local Voluntarism: The Medical Mission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Hong Kong 1842-1923", *In Healing Bodies Saving Souls: Medical Mission in Asia and Africa*. Ed. D. Hardiman, (Amsterdam-New York, Rodopi, 2006), 91.

16 T. M. K. Wong, "Local Voluntarism: The Medical Mission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Hong Kong 1842-1923", 92.

香港開埠初期，管治者並無心提供醫療衛生服務。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佔領香港的義律（Charles Elliot）曾希望香港成為「遠東的商業中心」。他宣佈香港為自由港後，不少英國商人從澳門遷往香港，以享受英國的保護和自由貿易。

當時，很多人形容香港為一個「荒島」，只有幾個漁村，人口約7,000人。1843年6月26日《南京條約》獲得批准後，維多利亞城（The City of Victoria）迅速發展，砵甸乍（Henry Pottinger）成為香港首任總督兼總司令。一座新城市需要相當多的基建，例如道路、房屋和碼頭，可幸有華工從內地湧入香港尋找工作，因此勞動力並不短缺。由於香港是自由港，由誰來支付政費是一個問題；英國商人認為本國政府應該出錢，但英國政府只提供了補助金幾年。結果，政府部門維持在最小規模，留給環境衛生服務的資源幾乎沒有，更遑論醫療服務。不幸的是，由於中國開放其他通商口岸，以及香港周邊海域海盜猖獗，香港未能如義律和砵甸乍所望，發展成為遠東的商業中心。大多數英國商人，除了自身的貿易，還將印度種植的鴉片走私到中國，以增加他們的利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政府庫房的收入大約30%至50%來自鴉片貿易，用於環境衛生或醫療服務的資金仍然很少。

儘管如此，維多利亞城還是逐步發展起來。人口從1842年大約7,000人增加到1852年23,000人，到1862年更上升到120,000人左右。由於香港是一個多山的小島，唯有沿着港島北岸的狹長地帶，可以廉價建造房屋。政府鼓勵種族分隔，隨着人口激增，建築用地短缺，原本居住在中區以西的華人，被要求進一步向

西及山上遷移，搬到太平山區，把地方讓給遷入香港的歐洲人。政府公然侵犯財產所有權，收回該地區，賣給歐洲人。政府接管了華人所有的地段，理由是他們在1842年購入的地段只是臨時的，因為那時《南京條約》還沒有被批准。華人業主被迫遷到太平山區，政府平整了那裏的土地，劃定街道，並免租金五年。<sup>1</sup>

建築用地不足夠，導致華人居住的細小唐樓過度擠逼。缺乏供水和垃圾及污水處理，令當時的香港，特別是太平山區，環境衛生惡劣。傳染病可以迅速傳播，容易成為流行病。的確，早期的香港，各種疾病如「香港熱」（後來證明是瘧疾）、痢疾和其他腹瀉病症肆虐。<sup>2</sup> 這些疾病導致警隊缺勤率高，政府因而聘請了一名殖民地醫官（Colonial Surgeon）來負責香港的醫療衛生。

1843年，安德森（Alexander Anderson）醫生成為第一位殖民地醫官，但他在一年後辭職，不久就去世了。最初的幾位殖民地醫官，在職不超過一兩年，他們有些在職期間去世，有些因健康不佳而退休。殖民地醫官面臨許多困難，這份工作不僅危險，因要接觸各種傳染病，而且相當辛苦，因為醫生必須騎馬到不同地方，診治大量的病人。那時香港還沒有公立醫院。起初，政府付款給海員醫院（Seamen's Hospital），代為收治病病的公務員和警察。最後，港督同意由政府開辦醫院，因為此舉確實比較省錢。1849年政府租用一間平房，作為臨時的國家醫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sup>3</sup>

1 Pottinger to Stanley, 17 July 1843, CO 129/2, 96-99.

2 Moira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1842-1941*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8), 18-22.

3 Treasury Chambers on Hong Kong 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 9 January 1849, CO 129/31, 69-74.